



A circular gold coin with a dragon design. The text "KANG NING TAI WU" is inscribed around the top half, and "1894" is at the bottom. The dragon is in the center, facing left.

湖北长江出版集團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

近代货币

史论

● 张 宁 /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0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货币史论/张宁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7

ISBN 978 -7 -216 -05146 -0

I. 中...

II. 张...

III. 货币史—中国—近代

IV. 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2364 号

中国近代货币史论

张 宁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省公安印刷厂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215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9.375
插页:5

版次:2007 年 7 月第 1 版
书号:ISBN 978 -7 -216 -05146 -0

印次: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0.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绪 论

货币是经济活动的润滑剂^①,货币史是经济史的一部分。今天,人们普遍认为,政府能否恰当地调节货币供应,对经济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在本书研究的历史时期,货币事务没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只是在发生严重的供应危机或者关系到政府的钱袋时,货币问题才会受到广泛的关注。

中国是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并率先发明纸币。当中国进入“近代”之际,货币制度却处于落后的状态,基本上是一种银钱并用(银钱平行本位,或称银铜复本位、银铜两本位)的币制,金属货币占绝对优势。贵金属白银还停留在称量货币阶段(银两),贱金属铸币铜钱经常要用于较大数额的支付。布罗代尔说:“货

①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可以是“任何在对货物和服务进行支付和清偿债务时被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小劳埃德·B.托马斯:《货币、银行与经济活动》,中国财经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货币有四项功能:交易媒介(或支付手段)、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价值贮藏和延期支付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从19世纪初启动金融近代化,某些金融工具作为金属货币的“替身”,有很强的货币性。比如:以庄票为代表的各类期票,能够贴现、转让,是近代金融领域的重要角色;过账制度,相当于现在的转账,最早的使用者是擅长金融业的宁波人和山西人。晚清时期,许多商埠相继发展出此类做法。这又关系到活期存款和支票存款(支票是转移存款余额的命令),现在它们被划入狭义货币(M1)。在P.金德尔伯格的《西欧金融史》一书中,类似的金融工具都放在“银行货币”一章。但本书所谈“货币”,仅限于金属货币和纸币。因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是货币制度,不必涉及上述的金融工具。而且,若讨论它们,将不可避免地由单纯的货币史扩大到金融史研究。

币方面,中国尚在比较原始的阶段。”^①就发展水平而言,中国不仅远逊于同时代的西欧,甚至比不上东方的印度和日本。

一、本书的研究对象

大约从 18 世纪下半叶起,中国的货币制度进入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期^②。在第一阶段,到清王朝灭亡时,旧制度已失去在货币流通、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的统治地位,向西方学习成为变革的方向,并在法律上确立了新的币制;在第二阶段,即中华民国前期,银两和制钱迅速退出历史舞台,货币制度出现跳跃式的进步。1935 年 11 月,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推行当时最先进的管理纸币本位^③,中国的货币制度与世界潮流完全接轨。本书研究转型期的第一阶段。

①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1 卷,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508 页。

② 货币制度的近代转型包括三方面内容:(1)货币自身的演进。从商品货币向信用货币发展,中间经历代用货币(兑现纸币)阶段。在中国,还有特殊的任务,即铸币(银元)取代称量货币(银两),贱金属货币地位降低;(2)货币的统一。价值标准和交换媒介趋向统一,可以避免因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及货币比价波动而产生的交易成本;(3)国家干预不断加强。在近代中国,币制转型逐渐等同于“西化”,即向西方学习,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本位制度。

③ “法币政策”对内实施管理纸币本位,推行不兑现纸币,由中央银行(当时是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管理货币发行,并运用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政策调控金融。对外是管理汇兑本位,固定法币对英镑的汇价。

本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近代史上货币制度的演变^①。所谓“货币制度”，是指国家以法律法规形式确定的货币及其流通的组织形式，它使货币流通的各个要素结合为一个整体，涉及货币材料、货币形态、货币本位、货币之间的关系，以及货币的发行、流通和管理。严格地讲，传统的银钱平行本位算不上“制度”。关于制钱有周密的法律规定，银两的铸造和行使则是自由放任。“不过假若放宽尺度来说，那么，历史上的各种措施，无论怎样混乱与不合理，都可以说是一种制度”^②。清代后期，货币领域是一个过渡期，看起来是愈趋混乱，但混乱中又有秩序，旧的制度没落下去，各种新式货币成长起来，新的制度也在酝酿之中。1910年，清政府公布《币制则例》，在法律上建立了银本位的近代货币制度。

研究货币制度，是考察货币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晚清时期，经济扩张、市场化进程加快，对货币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来自民间和政府的变革举措逐渐改变币制的面貌，其成效则不如人意。讨论货币问题的中外人士一致批评币制的落后与混乱，普遍认为它阻碍着中国的发展，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损失。他们的感觉既准确又不准确。币制问题与时势变化相关，或者说，是币制转型的要求与特定的社会条件相互作用的产物，它只是没有超出时代的限制而已。要打破这种限制，有赖于一个近代化的国家政权的形成。

近代币制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外交往的结果，“西法”的影

① 广义的近代从1840年到1949年，狭义的近代从1840年到1919年，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领域的“近代”各具特点，不可能列成方队，整齐划一地前进。研究者可以在大的框架内，适当调整“近代”的上下限。本书的近代取狭义，下限则定在1911年，只在少数问题上延伸到民国时期。这样断代是由货币史自身的特点所决定，正好是币制转型第一阶段的结束。

②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序言第8页。

响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诚然,没有外来力量,中国的币制也会遵循货币演进的一般规律,不断地发展。但“西法”提供了新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成了评判进步与落后的惟一参照系,从而将币制转型导向西化之途。

二、学术史回顾

对近代货币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清朝末年,货币流通极其混乱,币制改革是热门话题,专门的著述也应运而生,如梁启超的长篇论文《各省滥铸铜元小史》和《币制条议》^①、叶德景(J. Edkins)的《中国的通货》(*Chinese Currency*, Shanghai, 1901)、马士(Morse)的《中国的货币和度量衡》(*Currency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China*, Shanghai, 1906),这些研究还处在萌芽状态^②。

民国时期,货币流通的混乱状态长期延续,吸引了一些学者的兴趣。他们从历史入手,探讨币制问题的渊源。研究者中仍有一些在华外籍人士,如上海著名证券经纪人耿爱德(E. Kann)^③。这

① 见《梁启超全集》第7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② J. Edkins的著作研究整个中国货币史,“按时代分先后,但不是一本有系统的历史著作,而是一百三十篇短文的集子”(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27页)。Morse的书亦未看到,据耿爱德说“从来研究中国事物的著作,似有一普遍的趋势,于货币问题多略而不书。间有作者,亦语焉不详。如摩斯之书,诚不愧为名作;惟过于简略且偏重于历史记载”(《中国货币论》原序)。

③ 清末和民国时期,一些长期就职于中国金融机构、或热衷于收藏中国钱币的外籍人士著有多种货币史和钱币学的专著,可惜多用英文写成,在中国流传不广,如最近才译成中文的《中国当十铜元》([美]伍德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一时期的学术论文很少^①，较具价值的成果是几部货币史的晚清部分，包括张家骥的《中华币制史》（民国大学1926年版）、贾士毅的《中国货币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耿爱德的《中国货币论》（中译本，原著成于1926年，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和吉田虎雄的《中国货币史纲》（周伯棣译，中华书局1934年版）^②。因作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内容都稍嫌简略，且多是一般性的介绍，但大体上能勾勒出币制变革的全貌。这几本书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的币制还延续着晚清以来的混乱局面。因此上述几位作者都痛诋中国币制的弊坏，此外缺少更深入的研究。这一时期，史料整理工作初见成效。民国初年，财政部钱币司编过一部《币制汇编》（七编），其中“货币法规”、“铸造银元铜元时期币制案”、“铸造新币时期币制案”、“纸币案”、“造币厂沿革案”等五编收集了清末民初币制改革期间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和官方文件，“币制论著”上、下两编内有19篇重要的论著。1932年，陈度编纂的《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由上海瑞华印务局印行，该书从各类档案、文献、报刊中辑出大量官方文件和私人著述，分类汇集，对后来的研究者颇有帮助。

新中国成立以后，近代货币史研究进一步拓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出版了几部专著和史料汇编，标志着整体研究水平上

① 下面几篇论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卫挺生：《清季中国流行之货币及沿革》，《清华学报》第1卷第2期，1924年；汤象龙：《咸丰朝的货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第1卷第2期，1933年11月；杨荫溥：《中国货币的过去与今后》，《新中华》第2卷第1期，1934年3月；谭彼岸：《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新货币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第6卷第1期，1939年6月；魏建猷：《清代外国银元之流入及其影响》，《东方杂志》第41卷第18号，1945年9月。

② 吉田虎雄的原作名为《中国货币研究》，周伯棣修正了原作的错误，并增补了大量内容，一定程度上是再创作。

了一个台阶。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杨端六的《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 1964 年版)和魏建猷的《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 1955 年版),都对晚清币制演变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无论是史料的搜集、运用,史实的分析、判断,都有长足进步。彭信威功底扎实,考证严密,将货币史的经济内容提到了突出位置,提倡“货币史研究应把历代的货币问题同当时的经济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和概括”。作为“一种新的尝试”,货币购买力的变动及影响占了《中国货币史》的主要部分,因此轻视了货币制度的研究。在该书的晚清部分,叙述货币制度的内容又有太重的钱币学味道,一些重要问题一带而过。魏建猷着重剖析币制变革的内在原因和发展过程,但在史料的把握上不如《中国货币史》,内容也比较简单。《清代货币金融史稿》采用一种特殊的写作方法,大部分内容是摘录史料原文。虽说排比得法,议论少而精当,但结构不免有些松散。外币在华流通是近代货币史上的重要问题。献可的《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依据外文原始资料,考察外钞的发行、流通,尝试估计了不同时期的外钞数量,堪称开创性研究。近代的货币学说一直处于研究空白状态,叶世昌的《鸦片战争前后我国货币学说》(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将当时的货币论争置于历史转折的大背景之中,揭示出传统币制和货币观念的困境。这一时期,史料整理工作有重大突破。1964 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辑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 1 辑(“清政府统治时期”)由中华书局出版,所辑资料以当时的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所藏清政府军机处档案为主,并补充了一部分私人著述和报刊上的文章,但没有货币理论的资料。《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按不同历史时期货币制度的发展情况分为若干章,各章之内又按货币形态分为若干节、目,节、目内的资料则以时间先后为序。《中国近代货

币史资料》的出版,对近代货币史、财政史、经济史的研究有重大意义,尤其是通过政府档案能够深入了解清政府货币政策的变化。

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上述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半殖民地半封建”观是基本的调子。“两半论”原是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一种概括,不无道理,若将它作为研究的模式,把各种现象纳入这两个“半”中,“不归杨,则归墨”,就有问题了。以之研究晚清币制演变,自然是一个沉沦的过程,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货币流通”,在《辛丑条约》后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货币制度。即使承认有限的进步,也更多地强调其局限性。那些“反面”的东西很难得到平允和细致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学者的成果以专题为主^①。总体研究水平不高,高质量的成果较少,重复建设较多。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有一定进展:

1. 区域研究受到关注。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货币流通状况差异很大。如果只从总体或大范围来研究,容易简单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了多部地方性的近代货币史著作,从整体上考察某一地区近现代时期的币制变迁,但晚清的内

^① 一些综合性金融史、货币史著作的部分章节概述了近代货币制度的演变过程,如中国人民银行编《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姚会元:《中国货币银行(1840—1952)》(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张国辉:《中国金融通史》第二卷“清鸦片战争时期至清末时期”(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但整体观点缺乏大的创新。此外,一些财政史、断代史、经济史著作也涉及近代币制问题,所占篇幅较小,内容也很简单。

容较少,这是因为货币史料零星分散,不易搜集^①。近年来的一些学术论文基于罕见史料,深入剖析个别的地方性货币现象,是近代货币史研究的新趋势。如王雪农等人的系列文章《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中国钱币》1999年1—4期、2000年2—3期)以传世民间票帖实物结合文献,研究清乾隆至民国年间山西民间票帖的产生和发展,对研究近代私票的源流有重要价值;陈景熙的论文详细介绍了潮汕地区的虚银元本位制,揭示出近代银元制度的多样性^②;肖丽梅的硕士论文深入研究福州地区“台伏”的历史(论文第5章),提供了近代货币本位混乱的一个极端案例^③;赵洪宝依据天津市档案馆藏天津商会档案,详细阐述铜元危机在天津的表现,及其对币制变革的复杂影响,在研究的深度和史料利用上都有新的收获^④。

2. 外币在近代货币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历来是研究的重点。黄寿成、姚会元、金德平、张宁广泛搜集文献和考古资料,追溯

① 郑家度:《广西近代货币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吴志辉:《广东货币三百年》,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胡学源:《东北近代币钞考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陈景熙:《清末民初地方虚位币制研究——以潮汕“七兑银·七兑票”为个案》,《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增刊。

③ 肖丽梅:《近代福建钱庄业研究(1840—1949)——以福州、厦门地区为中心》,福建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学位论文。

④ 赵洪宝:《清末铜元危机与天津商会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4期。

外国银元在华流通的历史及其影响,基本上解决了这一问题^①。长期以来,外币的渗透被视为一种经济侵略,是货币制度“半殖民化”的表现。张宁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外币流通为法所不禁,大部分外币是中国人主动接受,并强调外币推动币制变革的作用^②。

3. 货币思想史研究的突破。货币思想过去不受重视,彭信威先生便认为“要从当时的著述和言论中找到对于货币理论有什么创见,一定会失望”^③。但研究过去的货币思想,不一定非要找到什么创见,而是从中发现时代变迁的信息。叶世昌的《中国货币理论史》下册(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系统论述了近代的货币理论发展情况,资料丰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足之处是研究对象偏重于专门的著述,对一般的言论观照不够^④。

4. 银钱比价研究的深化。晚清时期,货币种类增加,比价关系愈形复杂,银钱比价仍是最重要的一种。鸦片战争前后的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是老话题,彭泽益的文章虽然没有新观点,但资料较为丰富,分析了货币危机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全局性危害^⑤。从19世纪50年代起,银贵钱贱一变而为银贱钱贵,银价下跌的趋势延

① 黄寿成:《外国银圆在中国的流通》,《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年第4期;金德平:《论我国主币单位“圆(元)”的由来》,《中国钱币》1995年第1期;姚会元:《中外钱币交流及西方银元流入对中国货币近代化的影响》,《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张宁:《墨西哥银元在中国的流通》,《中国钱币》2003年第4期;张宁:《论我国现代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的确立》,《史学月刊》2005年第2期。

② 张宁:《清代后期的外币流通》,《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③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20页。

④ 笔者检索到一些关于货币思想和货币论争的文章,但多为炒现饭,与叶世昌和台湾学者的研究(见下文)相差甚远,没有多少参考价值。

⑤ 彭泽益:《鸦片战争后10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续至清末。郑友揆和周广远的论文将国际金银比价、国内银钱比价、物价联系起来,反映出国际货币制度变革对中国货币制度的冲击^①。银钱比价的周期性波动是清代币制的痼疾。继杨端六之后,王宏斌的著作全面透视 1766—1911 年银钱比价波动的 5 个阶段及其对社会经济、财政收支的影响,视野开阔^②。不过他对白银的地位估计过高,削弱了论证的可信度。

5. 对币制改革的初步探讨。清末币制改革是近代货币史的重头戏,内地学者有一些成果发表,开始引进现代化范式,审视改革的成败得失^③。但关注力度还嫌不够,已有的论著都是粗线条的研究,立论也以批评为主。

6. 咸丰朝的“通货膨胀”是晚清币制演变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彭泽益、张国辉、唐晓辉等学者对此做了充分研究^④。

上述研究成果无疑拓宽了货币史的研究领域,并在若干问题上有所深化,但总体水平较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尚无实质性的突破。多数论者的研究思路仍然局限于“两半论”,直到 90 年代初期,还有学者写出“封建性的银两、制钱和银钱票,……资本主义

① 郑友揆:《十九世纪后期银价、钱价的波动与我国物价及对外贸易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周广远:《1870—1894 年中国对外贸易平衡和金银进出口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 年第 4 期。

② 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③ 可参见张振鹄:《晚清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张国辉:《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近代史研究》1997 年第 5 期;邓绍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币制改革及其失败原因》,《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9 年第 2 期。

④ 彭泽益:《1853—1856 年的中国通货膨胀》,《19 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张国辉:《晚清财政与咸丰朝通货膨胀》,《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3 期;唐晓辉:《咸丰朝户部钞票舞弊案》,《清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

性(也是殖民地性)的银元、铜元和银行兑换券”^①。给各种货币扣上意识形态的帽子,殊无必要。近几年的文章有摆脱“两半论”的趋势,但仍然更多注意币制混乱、改革失败等负面的东西,而且眼界也只在晚清。

钱币学是货币史的姊妹学科,两者的关系类似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关系,而且更为紧密^②。20世纪80年代以来,钱币收藏不断升温,钱币研究迅猛发展,出现了《中国钱币》等十几种专业刊物。经过20多年的探索,近代史上各个货币种类都得到了较为全面的研究^③。近年来,一批高水平的钱币学专著和图录相继出版,如《中国近代纸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钱票》(中华书局2001年版)、《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纸币》(上海书店1991年版)、《中国历代货币大系·清民国银锭银元铜元》(上海书店1998年版)、《中国银币目录》、《中国铜币图录》、《清代旧纸币图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等,提供了大量钱币实物资料,是货币史研究的重要素材。

与内地的研究相比,台湾学者的成果虽然不多,但学术水平较高。鸦片战争前后的货币危机是老话题,林满红女士的系列研究

① 张通宝:《湖北近代货币史稿》绪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② “中国货币史主要研究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货币政策和货币制度,货币的铸造、发行和流通情况,货币价值和物价的变动,货币思想的发展等。钱币学主要研究钱币的形制、版别、重量、文字、书法、金属成分、铸造技术等,并进而研究产生某种钱币的历史背景及其历史作用。显然,这两门学科存在着很多交叉,特别是近年来这种交叉更有了发展。虽然如此,这两个学科仍有各自存在的理由,不能合而为一”(叶世昌:《中国金融通史》第一卷,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③ 本书引用了大量钱币学的文章,因篇数较多,不便在此罗列。可参见正文注释及参考文献。

充分利用中西文史料和未刊档案,观点独到,超越前人。《中国白银外流与世界金银减产(1814—1850)》(载《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4辑)探讨世界经济萧条、贵金属减产与中国白银外流的关系,认为在鸦片进口之外,世界形势的变化实为白银外流的更深一层的原因;《嘉道年间货币危机中的社会理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将经世学者分为“务实派”和“道德派”,挖掘传统思想蕴含的诸多不同的经济观点;她对银贵钱贱现象的研究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通过银钱比价变动的区域分布,讨论世界经济对中国的空间影响,及全国性的经济联系^①。其他台湾学者的兴趣集中在清末的币制改革。卓遵宏《中国近代币制改革史,1887—1937》(国史馆1986年)考察从广东申请开铸银元到法币改革期间货币政策的演变,视野较开阔,但主要内容集中于民国,全书585页中仅有100页讨论清末的币制问题。何汉威《从银贱钱荒到铜元泛滥:晚清新货币的发行及其影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2辑第3分册)分析了龙洋、铜元等新式货币发行的利弊得失,指出清政府处理货币问题时的随意性和热衷牟利的缺点。李宇平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透视清末币制改革,《张之洞的货币政策1889—1907》(《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11期)研究张之洞的货币改革思想和实践活动,肯定其在近代币制演进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近代中国的货币改革思想,1902—1914》(师大历史研究所专刊1987年)比较了五花八门的

^① 林满红:《嘉道钱贱现象产生原因“钱多钱劣论”之商榷》,《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银与鸦片的流通及银贵钱贱现象的区域分布,1808—185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林满红曾在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研究所攻读博士,其论文 *Currency and Society: the Monetary Crisis and Political Economic Ideology of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是该所1948—1995年间中国近代史领域惟一关于货币史的博士论文。

改革设想和方案,分析清廷和民国政府无力改变传统,不得不选择银本位的原因。赖建诚《梁启超与清末民初的货币改革》(《新史学》卷11第3期)研究当时的货币问题专家梁启超作为改革的倡议者和参与者的经历,在金本位和梁启超前后立场变化等问题上,发前人所未发。此外,朱宏源《近代广西货币的变革,1662—1937》(《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9期)是区域货币史研究的上乘之作,该文从变迁的角度,透过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力量之互动,叙述广西完成货币现代化,特别是制度方面剧烈变革的经过,只是文章主体内容的时间段为民国时期。总体上,台湾学者立论平实,搜集、解读史料的功夫扎实,讲究学术规范,没有平庸之作。

因条件所限,笔者对外国的研究状况了解较少。相对而言,日本方面的成果较多。20世纪前期,日本对包括币制在内的中国问题都有“特殊”的兴趣,当时出版的多种调查资料都涉及到币制,如《第一回中国年鉴》、《支那经济全书》(东亚同文会1907—1910年出版)等,客观上保存了一些珍贵的史料。日本学者的专著也不在少数,如佐野善作《清国货币问题》和《沪汉金融机关》(合称《清国货币问题、沪汉金融机关调查报告》,东京高等商业学校1905年版)、清水孙秉《清国货币论》(东京富山房1911年版)、根岸佶《中国货币改革论》(东京支那经济学会1919年版)、井村薰雄《中国的金融与货币》(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4年版)及《中国的货币与度量衡》(东京大阪屋号书店1926年版)、吉田虎雄《中国货币研究》(山口市东亚经济研究会1933年版)、宫下忠雄《中国货币制度论》(大阪宝文馆1938年版)^①。二战后,日本学者在这一领域仍陆续有成果问世,大都以史料功夫见长,其细密的分析、严谨的治学态度都值得中国学者学习。如百濑弘《清代西班

^① 陈锋:《20世纪的晚清财政史研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

牙银元的流通》大量使用外文资料和地方志,勾沉索隐,还原了著名的西班牙银元在中国币制演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①。仓桥正直《营口的公议会》一文利用日本军方、外务省和满铁等机构的调查资料,以营口为中心,研究晚清东北地区的民间组织—公议会,从中可以了解东北地区特殊的过账通货体制^②。

就笔者所知,欧美学者的研究成果较少。20世纪60年代,〔美〕景复朗曾著有《中国的货币金融政策(1845—1895年)》^③。1981年,王业键先生^④的《中国近代货币与银行的演进(1644—1937)》(中文本,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出版,该书货币史方面的内容着重分析清代“银铜复本位”货币制度何以不能适应商业化及经济发展的需求,认为清代官方货币政策不能因应经济形势的变化,结果形成诸种货币杂然并陈的局面。19世纪中叶后,中国政治统治趋向分裂。但经济却有日渐整合趋势,到抗战前中国货币终于由纷乱而归于统一。溯其源,则要归功于五口通商以后,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势力的整合促使货币使用趋于统一成为可能。该书的贡献在于系统地提出币制近代化的思路,将法币改革以前100多年的币制变革看作一个连

① 《清代西班牙银元的流通》,《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6卷,中华书局1995年版。

② 《营口的公议会》,《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③ Frank H. King: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845—1895*, Cambridge, Mass,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未见原书。

④ 王业键先生为美国肯特(Kent)州立大学教授。1992年退休返台,供职于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